



义起膳方

方膳起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方 腊 起 义

上海冶金第二机修厂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 编著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方 腊 起 义

上海冶金第二机修厂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 编著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25 字数 34,000

1976年7月第1版 1976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71·216 定价: 0.15元

列 寧 語 錄

宁可同肮脏制度的保卫者直接斗争而死，
也不愿象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驯服的牛马那样慢慢
地死去，这才确确实实称得上英雄。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目 录

略论方腊	史 文	1
方腊起义		14
一、北宋末年农民的苦难生活		14
朝政腐败 民不聊生		14
花石之扰 江南汹汹		18
二、“永乐”农民政权的诞生		21
首义“七贤” 诛杀鹰犬		21
漆园誓师 创建政权		24
三、“法平等”的吼声震撼东南		29
设伏息坑 首战告捷		29
直下睦歙 歼敌杭城		31
东南大震 烽火四起		37

四、在风云变幻的日子里	40
坚持革命 反对招抚	40
战略失误 义军受挫	42
五、根据地保卫战	45
杭城陷落 退守青溪	45
帮源激战 血染山河	47
六、气贯长虹的革命史诗	48
关于方腊起义的调查	54

略论方腊

史 文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在这里，毛主席明确告诉我们：宋江是投降派，方腊是革命派。最近，我们在皖南、浙西一带，对方腊的革命事迹进行了实地调查，搜集了一些谱牒、碑刻和传说材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方腊起义的有关材料，恢复被《水浒》作者歪曲了的方腊的革命派面目，肯定方腊领导农民革命的历史功勋，可以帮助我们划清革命派与投降派的界限，总结历史经验，服务于现实的阶级斗争。

一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我们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农民革命英雄方腊的阶级地位过去被剥削阶级的记载所歪曲了。

方腊的阶级出身是什么？过去的封建文人说他“家中中产”，“有漆林之饶”，并当过“里胥”，起码是个中小地主。最先提出此说而被经常引证的，是南宋的《独醒杂志》。它的作者曾敏行，世代业儒，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派。此人二十来岁便“病废”在家，这本书是他关在房子里写的。其中的记载，往往“不辨而述”，“失之不考”，有的“尤如儿戏”，不足为据。^①我们最近调查，大量材料证明：方腊是今安徽歙县人，曾在歙县、青溪先后为佣，是佣工出身的贫苦农民。元代徐直之写的《忠义彦通方公传》载：方腊，“其初歙人”，后来在青溪帮源方庚家做“佣人”。^②与徐直之同时的淳安（青溪）县尹刘彭寿，在他的《宋故承信郎彦通公墓亭记》中更明确地说：宋宣和间，“有歙人名腊者，来佣于家”。^③徐直之是方庚后代的亲戚，有关方腊为佣的情况，来自方家祖辈的传述；而刘彭寿生平喜听“田里遗事”^④，他的记载也应当是可信的。清初修成的《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有三处提到方腊是“佣人”出身。一是卷二选载的桂林方氏谱序中说方腊是方庚“家佣”；二是卷十二余坡分派世系前言里提到：“宣和间，（方庚）遭佣人方

① 《四库全书总目》

②③④ 《桂林方氏家谱》

腊叛戮全家”；三是同卷方有常条，也提到方腊“向佣于家”。此外，民间传说方腊还做过桶匠。当时皖浙山区的桶匠，沿门替人做活，也属于短工、佣工一类。

毛主席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农民是革命的阶级，而其中雇农、贫农是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主力军。“佣工”即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他们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在人身上受凌辱，“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宋代，贫苦的“客户”或“佣工”，处于最悲惨的农奴地位，“田主”、“富民”对待他们“鞭笞驱役，视以奴仆”^①，而方腊的雇主方庚之父方有常，是大米商、大地主，又是“大朝奉”兼“里正”；方庚本人，则是帮源一霸，那一带“众皆惮之”^②。方腊在他家为佣，其所受压迫和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见。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使方腊心中早就埋下反抗的火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方腊便是从一个雇佣的奴隶走上革命道路的。

据南宋初年编写的《严州图经》记载：“方腊起歙岭”，即在今皖南歙县境内起义。这是关于方腊起义的

① 苏洵：《嘉祐集》卷五

② 《桂林方氏宗谱》卷一《洪丞相奏文》

最早记载。这次起义的情况,《山郭方氏源流族谱》记载得比较清楚:宣和二年(一一二〇年)十月初九,方有常、方庚全家由青溪帮源迁至邻近的歙县七贤村,“方腊党寇”来该村,手执锄铲“招舞”,杀了大地主方有常,并“缚杀家属四十二口”,只有方庚“跳墙走去”,才得逃脱。徐直之在《忠义彦通方公传》中也明确说过,方腊“首屠公家而起”。《山郭方氏源流族谱》和徐直之的记述,无异是对《严州图经》最好的注释。

毛主席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方腊“起歙岭”的史实,不仅反转过来印证了他出身于佣工的可靠性,而且进一步表明:这次起义是从对土豪劣绅的营垒进攻开始的,代表了当时贫苦农民的阶级利益。曾敏行制造方腊“家本中产”又为“里胥”的说法,歪曲方腊的阶级出身,其目的无非是歪曲这次起义的阶级基础,掩盖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有的史书不仅把杀方有常一家的地点误定为帮源,甚至把方腊与方有常、方庚说成是长幼兄弟关系,把方腊杀方有常一家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说成是父子相残、兄弟阋墙的家庭纷争,也完全出于同一目的。

方腊“起歙岭”的时代,宋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秋。以宋徽宗为首的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满足荒淫无

耻的享乐需要，一再借口“租课太轻，不足于用”，下令“添立租课”^①。他们在东南一带征发“花石纲”，闹得“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②。就在这举国民怨沸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方腊在歙县七贤村杀了方有常一家后，便“还处帮源”^③，以当地穷苦农民信仰的“食菜事魔”教为纽带，把群众组织起来，并在宣和二年十月（一说是十一月）于青溪帮源起义。方腊在一处漆园里发表了誓师演说。他义愤填膺地揭露了封建剥削制度的腐败，控诉了“官吏侵渔”，苛求无已的罪恶，反映了“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的悲愤心情，并且发出了“仗义而起”的革命号召。^④誓师之后，“贫乏”之民闻风响应，“数日有众十万”^⑤。就这样，方腊在东南一角擂响了向宋王朝进攻的震天动地的革命战鼓。

二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区别革命派和投降派，根本的一条是看他制定和执行的是什么路线。

① 《文献通考》卷七

②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

③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

④⑤ 洪迈：《容斋逸史》

方腊起义后，自号“圣公”，建元“永乐”，南面为君，提出“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的革命目标^①，决心推翻赵宋王朝。这是一条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封建制度的象征，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国家的最高权威。不反皇帝，就谈不上反封建，就算不上真正的农民革命；不反皇帝，就会“顺”皇帝、“保”皇帝，最后必然接受皇帝的招安，成为投降派。方腊在起义中敢于树立推翻赵宋王朝的革命目标，说明他的起义路线反映了农民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

方腊在领导起义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实践了这条革命路线。

打击地方官吏。方腊义军所到之处，“唯搜求官吏”^②，“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③。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吏，是皇权在各地的支柱，正如马克思说的：“就象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对地方官吏的打击，是打击皇权的重要步骤。

① 《容斋逸史》

② 《宋史·陈遵传》

③ 《容斋逸史》

打击地主绅士。义军所到之处，“劫富室”^①，“劫取大家财”^②，对于为害一方的恶霸，则毫不留情地镇压。在封建国家中，皇帝“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打击这个“基础”，就是打击封建势力，也就动摇了皇帝的统治地位。

攻城夺池，“横行州邑”。方腊在帮源起兵后，旋即占领青溪县城，接着便乘胜进军，“连陷郡县数十”^③。义军到处，“官军莫能挫其锋”^④。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到一一二一年二月，“永乐”大旗已飘扬在睦（今浙江建德）、歙（今安徽歙县）、杭（今浙江杭州）、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衢县）、处（今浙江丽水）等六州五十二县。“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只有把地主阶级控制的州邑郡县夺过来，才能拔掉各地的封建堡垒，朝着“混一”全国的大目标前进。

反对孔孟之道。方腊领导起义军在思想领域里向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孟之道进行斗争，批判了反动的理学。宋代理学是孔孟之道的哲理化。它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俯首帖耳地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方腊在

① 方勺：《青溪寇轨》

② 《南涧甲乙稿·处州东岩梁氏祠堂碑铭》

③ 《容斋逸史》

④ 《两浙名贤录》

漆园誓师时，就指出压迫剥削无理，号召人民“仗义而起”。义军到处，就焚烧传播孔孟之道的“学宫”，镇压反动儒生。同时，起义军“不事神佛”，“尤憎恶释氏”^①，到处拆庙宇，毁寺观。宋代，儒、道、佛三教合流，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束缚人民的思想绳索。起义军反对儒、道、佛的斗争，就是摇撼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

方腊的路线是革命的，还表现在他提出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② 这个革命的政治纲领中。这个纲领继承了农民革命的“均平”思想的光荣传统，并把它大大推进了一步。在农民阶级反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方腊“法平等”的纲领，击中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要害。方腊领导的起义军，在政治上，无视“君臣上下”^③；在经济上，“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④；并提出“男女无别”^⑤ 的平等主张。这虽然还只是朴素的平等观，但却表现了同封建等级制度不妥协的精神。

正确的路线，必然是保护人民，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为人民所支持和拥护的。在方腊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起义军对人民秋毫无犯。安徽黟县“灵惠庙”还有

①④ 《容斋逸史》

② 《鸡肋篇》

③ 《高峰文集》

⑤ 《老学庵笔记》

南宋绍兴二十七年（一一五七年）刻的一块庙碑（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其中有“昨方腊等贼入界，保全生灵安业”之语。“生灵安业”，决不是神的“保佑”，这块庙碑，正是方腊起义军保护人民的历史见证。相传浙江桐乡县乌镇有座“哭送亭”，是当年乌镇人民哭送起义军由秀州退军的地方。人民群众对起义军真是一往情深，亲如骨肉。

对方腊的革命路线进行分析研究之后，就能清楚地知道，这支起义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真正的革命派。而《水浒》中的宋江，打出的是一面“替天行道”的白旗，推行的是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投降派。

三

革命路线确定之后，能否把这条路线坚持到底，这是检验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方腊革命精神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在同敌人浴血奋战的过程中，不动摇，不变节，不受敌人利诱，不惧敌人威胁，具有崇高的革命气节。

方腊领导的农民革命的烽火，在皖浙地区越烧越旺，以致“东南大震”^①。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惶恐万状，采取了反动统治阶级惯用的反革命两手政策，

^① 《宋史·童贯传》

军事镇压与政治诱降。宋徽宗在得到东南告急的“警奏”之后，在气急败坏地调集“京畿禁旅及秦晋蕃汉兵”杀气腾腾扑向东南的同时，曾多次降诏“招抚”。方腊及其领导的起义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反动派懂得用“招抚”的一手瓦解革命比之用武力扑灭革命要“合算”得多，这可以不烦一兵，不费一矢，就能把革命力量转化为反革命力量，把“对头”变成帮凶。宋徽宗在“招抚”的诏书中，提出了论“功”给“赏”，“以靖南土”^①。对于宋徽宗的诱降，以方腊为首的起义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一次，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招抚”诏书声称，起义军“如能束身自归”，“即优与推赏”^②，而在二十九日，方腊却“进逼杭州，……州即陷”^③，这对宋徽宗是当头一棒；宣和三年正月，徽宗再下诏书，特地提高赏格，用重金高官来诱降起义军，也就在这个月，“方腊陷婺州，又陷衢州”^④，再一次把“圣旨”踩在脚下；第三次招降是在同年二月，诏书下后，“方腊陷旌德县及处州”^⑤，吓得守将自刎而死。北宋王朝的“招安”政策就这样破了产。

招安政策，对《水浒》中的梁山起义军能起作用，而在方腊起义军面前却一再碰壁，原因何在呢？唯物辩证

①② 《宋会要辑稿》

③ 《青溪寇轨》

④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

⑤ 《续资治通鉴》卷九四